



浏河十八湾

柯 蓝

浏河十八湾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7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1}{4}$

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889

定价 0.80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里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，湖南浏阳河畔一个地委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故事。作品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人情，描绘当地农业建设过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热情歌颂那些坚持民主办社、反对贪污盗窃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，批判破坏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思想。

浏阳河呵，碧绿的浏阳河

——代序

我从一九五八年，就断断续续到湖南浏阳县收集素材，深入生活。浏阳是老革命根据地，它的西乡又和我的家乡交界，风土人情十分接近，到了那里就象是回到了老家，儿时的回忆，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，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。乡亲们的一个手势都叫我感到是那样亲切。在我遍访浏阳东、南、北乡之后，从“走马看花”到“下马看花”。后来又改为在西乡杨林大队落户，前后住了近一年。我虽然没有兼任什么职务，但我却和广大贫下中农群众，共过了一个时期的欢乐。在那一段难忘的日子里，我们一起劳动流汗，一起向贪污、浪费等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。在激烈的斗争中，群众把我当做他们的知心人，有的把一些揭发材料，悄悄地塞进我住的房门里。记得有一天夜晚，风雨交加，外面一片漆黑，我觉得我的窗口闪过一个影子，忽然靠近茶园的大门，发出了轻轻的响声，我原以为是大风把门吹动了。再仔细一听，是有人在推门。我连忙走过去，把门打开一看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，头上戴着一顶斗笠，站立在大雨中。她打着一双赤脚，十分机警地朝四周看看，侧着身子走了进来。这是五保户胡三婆婆。她冒雨赶来，向我秘密地揭发了农村资本主义恶势力，企图组织

的一场反扑。……广大贫下中农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斗争的决心，大大地使我感动，也更使我深受教育。在群众的热情鼓舞下，我把斗争中的故事，写成了一个近十万字的中篇小说，在《湖南日报》（农村版）上发表。不久，浏阳县花鼓剧团，把这个中篇改编成花鼓戏在县里上演。后来，我又到长沙县洞井公社顾家冲生产队参加农村工作试点。这回是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参加深入生活的。工作结束后，我又把生活中的一些故事，补充到原来写的中篇中去，修改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，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，送发各有关方面。后来，我正要准备根据各方意见修改，又遇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。于是，修改工作便中止了。从改写成长篇到现在，整整过去了十五年。今年我把这部长篇拿出来，十五年前的情景和人物又活跃在我的心头，使我还有条件和激情，又对它作了一番补充和修改。改完之后，但我的心情还是感到惶愧。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。我认为我还没有尽情地把我所想写的，全部写了出来。我不得不承认生活是真正的艺术。我几次想再回到浏阳西乡杨林大队去看看。我也几次给我的房东捎信，说我要回来了。但几次都没有去成。直到今年十月，我的愿望总算实现了。我可以回到我阔别十五年的生活基地了，但时间却只能停留一天，等于是匆匆路过。当我第一步踏进镇头区委会的时候，区委副书记冲过来，最先认出了我，热情地拉着我的手，比老战友重逢还亲热。我看了他半天，才把他认出来了。是时间太久，叫人遗忘了吗？不，主要是这儿的変化太大了。这位当年在道悟山上相逢的印象中的青年，现在两鬓也斑白了，叫我一时真不敢认他。别说

这,就连我望着矗立在浏阳河上新修的大桥,以及那条直通到我曾经住过的杨林大队的新修的马路,这一切都叫我吃惊得发呆起来。马路两旁新修的两层楼的卫生院、百货商店和银行、信用社,还有那一排排新开出的茶园,这一切过去根本没有。它们的出现,使你再也认不出当年的旧地。“千里来寻故地,旧貌变新颜。”这说明我们农村社会主义建设,是怎样在飞跃发展呵。特别是新修在河边的居民点新房,以及新建的电力排灌,已经把河水抽了上来,使原来缺水的“白田大队”,也改名为“良田大队”了。年年农田增产,茶叶增收,成为浏阳贡献给国家物资最多的地区。当然,离国家的要求,人民的期望,特别是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来看,这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,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还要提高。前面也还摆着十分艰巨的任务……我一边看一边想。不知不觉之中,我对这儿的感情,却愈来愈浓起来了。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冲击我……一种对往昔斗争的眷恋,和对即将来临的新的斗争的向往,这两种东西搅和在一起,使我产生了对这儿一种不可解除的、也说不清的感情……当我坐在老房东的灶屋里的时候,我甚至都发起呆来。现在,唯一保留着原来样子的,倒是我住过的那间土墙房子。这间房子我住在里面的时候,同时是工作队研究工作的地方,这里面经常挤满着一些骨干分子和贫下中农代表。他们每晚热烈地争论着开会,一直开到深夜鸡叫,才一个个离去。现在,这间房子还空着。年近六十岁的女房东,亲切地指了指这间房子。她这一指,包含了多少要说的话呵。我的心马上明白了,甚至毫不犹豫地回答她说:“好的!我会再搬来住到这里的……”就在这十分动情的

时刻，我全部记起了我十五年前，在这儿结识的贫下中农群众。就连每回我过河摆渡时，那个总是笑着和我谈话的老舵公，我也记起他来了。那时候，河上的桥还没有修起来，来往行人，去区里开会的干部，以及装满茶叶、杂货的小车，统统要等在河边，由一只古老的木船，慢慢地摆渡过去，又摆渡过来。老舵公掌着舵，或是摇着橹，而船上的乘客（多半是干部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），就自动出来用长长的篙子撑船，来回地帮助摆渡。这样，来往乘船，不用付船钱。而这位老舵公，他也不要求报酬。一则据说他是五保户，没有亲人，生活已由政府全部照顾了。二则他认为这种不管刮风下雨日夜为行人摆渡，在旧社会叫“行善”，在新社会叫为人民服务。他愿意牺牲自己（在物质上），而在精神上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。甚至还把他那个小小的家，也搬到渡船上来了。除了摆渡，我还多次专程去访问过他，在他矮小的船篷下作客……而这一切，记忆又多新鲜呵。现在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舵公，因为已经修起了大桥，自然用不到他了。但是，他现在调到哪儿去了呢？能在什么地方再找到他呢？……我一边走一边沉思。当我们离开杨林大队，又从大桥上经过的时候，我深情地望着碧绿的浏阳河。河水在静静地流着，我的眼光忍不住在四处寻找。这是在寻找那位明知不在的当年摆渡的舵公吗？是的。我是在寻找他！我是这样想念这位为别人而活着的善良的老舵公！我认为那些为别人做过有益的事情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怀念。即使今天我们可以从大桥上走过河去，但老舵公的精神、品德、形象，将会永远留在这美丽的浏阳河上……回忆令人思索得太远了，几乎使我无力把自己又拉回来。包括对浏阳河地区

这些说不尽、也说不清的斗争生活，人物的传说，一齐涌上了心头。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，真是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。我振奋，而又惶愧。我环顾左右，而又不知所措。我远远没有料到，在旧地重游的此刻，我的感情会如此惶惑。我是如此明确地感到，我确实是没有把这儿的生活，人们的命运的万分之一，尽情地抒写出来。大概就是这些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，连同我一些说不清的心意，压迫着我，使我如此难过吧，甚至都感到了一种窒息。这，这是我对这儿的负债吗？而这种情感上的负债，据说长久了，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燃烧的。那么就让它燃烧吧！燃烧就会发热，就会发光，就会产生一种更大的力量。到那时，我将又会提起笔来。……所以我回来后，在我的手冊上写了这样的话：“……用辛勤的汗水，革命的豪情，调制出最鲜艳的色彩，日夜不停地描画，社会主义新长征斗争中飞溅的火花……”这只是我内心的一点表白，用来自勉自策和对自己督促吧。

而这篇短序最后的话，仍然应该是留给那些在群众运动中献身，在斗争中促进历史前进的人民英雄。向他们致敬！向我在这本小书中描绘过的人民群众，以及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贫困、落后面貌，建设几代人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，所作的一切英雄行为和英勇的斗争，致以最大最深沉的敬意和怀念……浏阳河呵，碧绿的浏阳河，是这样拨动着我的心弦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，记起去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，我住在阔别了十五年的浏阳县委内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。这间房子正好面临着浏阳河，河水就在我这窗前流过。晨光中，宁

静宽阔的浏阳河上，连同整个浅滩，慢慢升起了一层白色的轻雾，有的停留在水面，有的随着微风在河面飘荡。轻雾越来越浓了，象是天女撒下来的连绵不断的长卷白纱。透过这皎洁明亮的白纱，后面是满天朝霞，一轮喷薄即出的红日，光辉夺目，这是多么奇妙的景致呵！这不正象征着我们社会主义农村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程吗！我是如此的兴奋、激动。当我凝视了很久很久之后，我低下头来，想看看流逝的河水。这时，河水却被凝聚的厚厚的浓雾蒙罩住了。那碧绿的河水，好象是在这令人惊奇、美妙夺目的前程面前，感到有些羞怯似地悄悄地流走了。我被这自然界一时的景色，引起了一个联想：这流逝的河水，是象征着往日的斗争吗？浓雾使我们看不清流逝的河水，但浓雾消失之后，我们就会看清楚它。那么对往日的斗争，通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，我们也将会慢慢看清楚它的功过。重要的问题，在于深刻认真总结，把历史推向前进，而要避免历史的重演。……

我把我这本小书献给读者，如果能起这么一点点作用，我就感到满足了。

作 者

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晚于北京沙滩

第一章

1

六月里的一个早晨，从长沙方向的公路上，来了一个人。他沿着浏阳河的小路，提着一个小小的网口袋，朝龙头市的白田生产大队走来。他年纪大约四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。从他的打扮，看得出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。他提的那个网口袋，是一九六三年流行的尼龙丝口袋，口袋里放着十几本书和一些材料纸，还有漱口缸、手巾、牙刷之类的东西。天气又热，路又远，他走得已经十分疲劳了，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，一边抬起头，望望那刚出来的却已经十分火热的太阳，在向路边上红薯地里的一个青年农民问路。他才问了几句，发现这个青年农民用锄头给红薯藤挖沟扶行，挖的沟太浅了，便把手里的网口袋放了下来，笑着走上去，用很亲热的声气说：

“这晌天连不下雨，田土太干了，挖得浅了不好。”说着，他就从青年农民的手里接过锄头，动手挖了起来。

青年农民有几分奇怪。这个城里人，他怎么也会挖红薯沟，他这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打问到白田大队去做么子？区上、县里、公社里都从没见过这个人，他这是什么机关下来的干部，还是参加什么调查组的工作同志？他在一边发呆地看，一

边想，有心开口问个明白，看见他鸡啄米一样地只顾埋头挖土，却又不好问得。那个人一口气挖了两行，把两尺多长的红薯藤，一根根摆好用土压牢。最后他伸起腰来说：

“你这红薯贴种得早，比别人长得好，要不是我昨天晚上开了一晚的会，我还想帮你再挖两行。”说着，他把锄头交给青年农民，走到路边上，捡起他的网口袋，就一个人往小路上走了。

青年农民在后边喊：

“同志！到我屋里去呷碗茶再走，歇歇气去吧！”

那个中年人回过头来笑笑，又走他的路去了。

青年农民还在后头过意不去地喊：

“同志，下次路过我这里，一定要进屋里来呷碗茶呀！”

那个中年人又回过头来笑笑，站了一站，又走了。青年农民这才拿起锄头，又拼命地挖起土来。挖着挖着，大约又挖了十几行，远远地从后面的大路上，有个人敞开衣服，急冲冲走了过来，看见这个青年农民在挖沟扶行，便大声喊：

“罗队长！那边渡口上来船没有？”

青年农民伸起腰来，看见他这样子，问道：

“你这么火烧屁股的，到渡口上搞么子去？”

那人说：

“嗨！等了几天了，说是从地委来了一位负责同志，接了几回没有接到。”

青年农民一本正经地问：

“负责同志？什么负责同志？”

那人回答说：

“新来的地委的副书记，过去是我们这里的县委书记。”

青年农民忽然想起了刚才从这里过身的那个提网口袋的人。难道那人就是新来的地委书记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接着又摇了摇头，他觉得自己有几分好笑。这个会挖沟扶行的人，怎么会是地委书记呢？一个从地委来的书记，哪会有闲工夫来帮我挖沟扶行呵！再说一个地委书记，至少也要带几个干部一路走，怎么会叫他一个人提起口袋，在这里问路？人家是为国为民办大事的人，日夜辛劳，那才不简单啦！他这么一想，便恭恭敬敬地问：

“新下来的地委书记，姓么子？叫么子？”

那人迅速地回答说：

“听说叫吴兴文，我按老规矩叫他吴书记。年纪只四十来岁。你要看见有这个人，你就赶快接他到大队上去。我打发人到渡口接了几次，自己也跑了几趟，都没有接到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嘴巴忽然凑近过来，放低声音说：

“这位地委来的吴书记，听说是十几岁就出门革命有经验的老干部，他这回来是下来搞调查研究的，从我们这里路过。公社叫我们好好接待他。”那人叽叽咕咕讲了几句，打起飞腿就跑了。倒弄得这个青年农民一时僵立在那里，象根木棍子。他现在忽然觉得刚才那个帮他挖沟的人，似乎就是下来搞调查的地委书记，心里一时真拿不定主意。

2

往渡口上飞奔接客的人，是这里的大队支部书记屈长发。

他是这个公社里，最年轻的一位大队支部书记，年纪只有二十四岁。脸圆圆的，被太阳晒得墨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会种田做工夫的好把式。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年，又积极，又热情，又舍得吃累。大家都很喜欢他。

现在，他头也不回，一气冲到渡口上，连声对着在渡口上等船的人喊：

“喂，渡船还没有开过来吗？有个从地委来的书记，你们看见没有？”这位青年支书仗着自己认得这一带远近三四十里宽的人，不呼名不叫姓地问了起来。

渡口上的人，马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回话。有妇女有男人，也有老馆子。大家都告诉他，没有看见这个新来的地委书记。人声中，还有一个中年妇女，笑着在喊：

“屈书记，你的腿真快，一早就过河来接客，又冲到哪里才打转呀！”她笑了一笑，又问：“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，是位过路神仙，还是长期下放来做土地公公的？”

挤在渡口上的人都笑了起来。屈长发认得这个说话的人，就是刚才在那边种红薯的罗建章的娘。人家都叫她做六婆婆。其实人才只四十几岁。他看见她在说笑话，本来也想回她一句。因为心里焦急，就没有开口。却不停地用眼睛在人群里扫来扫去。生怕把他要接的这位客人漏掉了。只是他接的这位客人，他没有会过面。他是昨天早上接到公社的通知，在电话里问了问客人的象貌，就打发了几班人到渡口上来接。今天自己又一早赶到渡口上来等。等了半个时辰，想起这渡口上，人多眼乱，容易错过，倒不如赶河那边去迎接。现在，他过河迎了十几里路，还没有到，才打转身又急急忙忙赶

回到渡口。他多么盼望趁这位上级路过这里，顺便检查一下他们的工作，给他们一些宝贵的指示。另外，他们大队这几年工作还做出了不少成绩，也希望更高的领导能够了解。同时县里几次指示，近来农村里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势力，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只是自己缺少经验，还不知如何下手。这就是他现在急着要见到这位地委书记的原因。他扫了几眼渡口上的人群，在这些人群里又怎么会有他要接的客人呢。满眼尽是穿着新鞋新袜的小孩，头上包着白花毛巾的青年姑娘和妇女，还有挑着担子、推着小车的男人们。这些挤在河滩上的小车和担子，不是装着干柴，就是挑的茶叶。他们这里是全县闻名的产茶区，社员们把做好的茶叶，送到国家的收购站去。他们站在渡口上，一边等船一边品评着各家的茶叶。屈长发失望地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走到左边石阶下面的那棵大樟树下，寻了一块砖头坐了下来。慢慢，他看见在人群的后面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手里提着一个网口袋。他的心猛地一动，莫非这个人就是他要接的客人吗？从打扮上看，这人硬象是从城里来的干部。还有他那网口袋里的书和漱口缸子。只是，他一看见那人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新橡胶鞋子，和一条褪了色的绿军裤，他这个念头又马上打消了。这种规格的草绿色胶鞋和裤子，只有解放军里的同志们才穿，十有九成，这个同志是从部队上请假回家来探亲的，千万不能错认了闹笑话呵！

屈长发迟疑了一下，故意又大声喊了一句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谁看见了过路的地委书记，就帮忙把他接到大队部来，千万别叫他走掉了。”

他一边喊还一边留神看着那个提网口袋的城里人。只是那个人没有什么动静，把头回了过来，正跟在他身边的一个青年说什么。屈长发偏过头去，用心听了听，也没有听清。倒是一个坐在石阶上的老馆子，手里拿了根竹棍，把竹棍在石阶上敲得咯咯地响。大声喊：

“长发呀！你要接的人，能不能降妖捉怪？”他打了一个干哈哈，又说：“给你这位大队支书讲句实话，我们这里，别的不要来，单缺一个包文拯，不晓得这位过路的是真老包，还是假老包。”

坐在大樟树人群后面的那个城里人，象是听见了这边的谈话。他一连几次把头回了过来。最后，又故意把头低佝起。看样子，他的耳朵倒是十分用心地在听这边的讲话哩。

这个人正是屈长发要接的那位地委副书记吴兴文。现在，他更加为难起来了。他先是不愿意惊动基层干部来接他，才躲着青年支书屈长发的。现在，听见这个老馆子这么一问，他倒又想趁势出来和乡亲们认一认。后来一想，还是不认的好，这样，可以听到一些背后的议论和群众的意见。

不过，这么躲在这里，他却有几分紧张和说不出的味道。吴兴文一九五一年在这个县里搞过土改，那时候他来过这里，对这带的情况还比较熟悉。只是隔了十二年，一直到一九六三年，他第二次到这里来工作。当时还是八九岁的儿童团，现在都长大得认不出来了，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刚才这个讲话的老馆子是谁？过去认不得，怎么记不起来了！他为什么要讲真包公、假包公？他怎么又问能不能降妖捉怪？这老馆子的话反映了什么问题？他作为地委派下来做调查研究的干

部，不能光只管调查，发现了问题也不解决。想到这里，他马上起了一个念头，本来他只想从这里路过的时候，顺便了解调查一下，他过去搞过土改的白田大队，有些什么变化。现在听见渡口上群众的这些意见，他马上想到他何不趁势在这个白田大队留下来，工作一段时间，好好解剖一下这只麻雀。反正在面上作一般的调查，他已经跑过三个公社了。现在倒不如在一个大队，一个生产队真正蹲下来，从调查、解决一些实际中的具体问题，摸索出一点经验。吴兴文一边想一边听，可惜的是屈长发跟这老馆子没有交谈起来。屈长发朝着老馆子横了几眼，没有工夫和他扯筋，看见河里的大渡船拢岸了，便一个人抢先冲了上去，过河去了。

看见屈长发上船走了，吴兴文也想跟着坐这一趟船。正要立起身，那个拿竹棍子的老馆子，对着船上迎面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喊：

“十漆匠，满机匠，你看见我们屋里友国没有？”

走在前头的十漆匠说：

“你莫问我！”他笑了笑，“我们又不是给你管崽的。”

老馆子叹了口气：

“你们这两个梦游神，反正不管队上的事。”

“队上出了什么事？”两个嘴巴同时问。

“队上五十几亩水田，都快干坏了！”

十漆匠跟满机匠都站了下来。吴兴文听说农村里干坏了水田，连河也不过了，他睁着一双圆眼在边上听着。他晓得眼下正是早稻快熟，中稻要扬花的节口，田里的水一滴少不得呵！今天一路上，看见各公社都在车水抗旱。为什么水田干

了五十几亩，生产队的干部不出来组织车水抗旱？大队上的领导，又怎么不管咧？他心里发急，可又不好出来插嘴。

立在边上的满机匠，呆了一下，回嘴说：

“病老倌，咯号事你不要操空心！只要我们的茶园干不坏，就成！”

十漆匠也搭腔说：

“嗨，行啦，我们的茶园算得是天老爷的满崽子。年年季季，露水下得均匀。人家队上老早茶摘不到手了，我们现在还有茶出。只要救住了我们这条命根子，那一点点水田，就是统统干死了，颗粒无收，我也不叹一口气！”

病老倌听了，把手里的竹棍子往上一扬，做出打人的样子，气鼓鼓地喊：

“你们听，你们听，这是人讲的话吗？水田是么子？是我们公社的集体经济，干坏了不要紧吗？真是么子鸟叫么子音，么子锣鼓么子声！我看你们这漆匠、机匠是吃石头长大的，把队上的水田统统干死，你们也不急，也不心疼！”病老倌子一边说一边气得手里的竹棍直打颤。

原来这个老倌子是天塘生产队的社员熊旺财，年纪有七十一岁。因为这几年常日害病，队上的人都叫他病老倌子。这时，病老倌朝四周看了看，在压制着自己不要生气。因为他，常年胸口疼，要是把病惹发了，又不得了。提起他这病，还是在他四十岁那年的冬天，那时他还是浏阳河边上的挖金工人。为了到河底挖沙金，河水冰透骨头，他脱光衣服跳下河去。有回不想天太冷，年纪也大了一点，他一头扎在河里，招架不住，一下撞在河底的石头上，顿时就昏昏迷迷，直往肚里喝水，真